

试论近代上海文化的底色

——旅沪苏州人与近代上海

张笑川

摘要：近代上海的繁荣奠基于各地移民的大量涌入，其中，毗邻的苏州府籍移民具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苏州商人已开始进入松江地区贸易，但规模较小。上海开埠后，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事期间及以后，苏州人迁居上海规模日渐扩大并形成潮流。进入民国，苏人迁居上海途径更趋多元化。苏州人在近代上海工商金融业和文教行业具有一定优势地位，苏州评弹、昆曲等文化形式亦在上海娱乐市场上居统治地位。伴随大量苏州人迁沪，苏州文化大规模传入上海，为近代上海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底色。

关键词：近代上海；旅沪苏州人；苏沪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11-0153-11

作者简介：张笑川，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江苏 苏州 215009）

苏州与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重心长三角地区的两座毗邻城市，其密切的互动关系，不仅对当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理解中国历史亦具有重要探讨价值。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宫崎市定曾指出“对每个时代，都必须采取适合该时代的研究方法。……仅就地域而言，江南，特别是苏州尤其重要。把苏州排除在外，就难以说明明清时代的历史，恰如把上海排除在外，就难以说明门户开放以后的中国近现代史。事实上，近现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与此同时，苏州的风气也转移到上海来。上海并非突然出现的，其历史背景即是苏州的存在。为了了解近现代上海的活动，有必要考察其嫁接之本的明清时代的苏州。”^①宫崎市定这番话相信很多人会有同感，但苏州的繁荣是怎么转移到上海来的？苏州的风气又是怎样转移到上海来的？宫崎市定并没有解释。近年来，关于繁荣怎样从苏州转移到上海，已经有较多的研究^②；而关于苏州的风气怎样转移到上海，似还缺乏研究。本文即试图对这一问题加以探究，其切入点是从苏州人迁沪历程以及苏州人在上海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入手。宫崎市定所言“风气”似相当于今日所言的“文化”概念。因此本文亦可称为对“上海文化”底色的探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目的不在对苏州文化与上海文化进行对比并研究两者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是比较文化学的任务，非历史学者能力所及。换言之，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作为苏州文化“传递者”的近代旅沪苏州人的分析，为两个城市的文化关联，提供一些参考。

收稿日期：2013-06-13

① [日] 宫崎市定 《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载刘俊文主编，荣成显、南炳文译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第261页。

② 参见周武《太平天国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周武《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上海文化》2005年第1期。

近代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①。各地移民的大量涌入为上海的发展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强劲的动力,移民群体在近代上海的崛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上海城市史研究中一直重视对移民群体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上海的苏北人、宁波人、广东人、福建人等移民群体的研究已达到相当程度^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上海社会中举足轻重的移民群体——旅沪苏州人的研究,则不尽如人意。虽然关于旅沪洞庭商帮、旅沪苏州文人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旅沪苏州人的整体研究则相对缺乏^③。本文即试图从群体的角度对旅沪苏州人予以研究,揭示其在近代上海文化形成以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④。

一、明末以来苏州人迁沪历程与规模

明清时期,苏州是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货物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重要中心^⑤。文化繁荣、工商发达的苏州对于他乡商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各地商人纷纷在苏州建立会馆,以联络乡情^⑥。此时的上海,由于棉布贸易和沿海贸易的发展,也处于崛起之中,并成为江南地区的一个区域贸易中心,但相对来说处于江南地区边缘^⑦。此时,苏州与上海的关系被形象地比喻为“大苏州、小上海”。

此一时期,两个城市虽然都分别吸纳大量外来人口,但多数为外省商人,两个城市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似不多见。明末以来,一些触角敏锐的苏州洞庭商人开始在松江、青浦一带设店收购棉布^⑧。例如,著名洞庭商人席端樊、席端攀两兄弟早年到松江学生意,后在朱家角开设店铺,席端樊次子席本久在朱家角镇建造“澹香别业”,后世子孙即定居于此。康熙年间,东山叶湘挟千金以市布,买一船往返于苏松,另有一位名叶婴晖的商人,也到松江贩布,不幸客死他乡。乾隆年间,叶达与其弟经商于南翔,发财后在住宅旁建园林,不时请文人觞咏其间。因收购棉布需要大量资金,苏州商人亦在松江主要城镇开设钱庄、典铺^⑨。康熙二十三年(1684),江苏海禁解除,翌年,上海设立海关,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各地商帮相继涌入。此时更多苏州商人来到上海开设行铺,从事商贸活动。如《墨余录》作者毛祥麟,其祖“定西公”即在乾隆年间

① 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② 主要著作有: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李城《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陈檀《民国时期上海的苏北移民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94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高红霞《上海福建人,1843—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 目前关于旅沪苏州人的研究,以洞庭商帮和东山家族,尤其东山席氏的研究成果为多(范金民、夏爱军《洞庭商帮》,黄山书社2005年版;马学强《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张海林在其关于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的研究中,也对近代苏州商人投资上海有一定描述(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9—101、118—119页)。此外,学术界对旅沪苏州文人研究也较为关注(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④ 1919年成立的苏州旅沪同乡会《章程草案》总则第一条称“本会由旧苏州府属旅沪人士所组织,定名为苏州旅沪同乡会。”清末苏州府辖吴县、长洲、元和、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常熟、昭文九县和太湖、靖湖二厅。本文所述旅沪苏州人,亦指苏州附属各县人士,而以吴县、元和、长洲三附郭县人士为主。另,本文撰写中,我的硕士研究生陈建荣承担了大量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特此致谢。

⑤ 参见[美]迈克尔·马默《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1127-1550》,载[美]林达·约翰逊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探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工商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史林》2003年第5期。

⑥ 范金民《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1期。

⑦ [美]林达·约翰逊《上海:一个正在崛起的江南港口城市,1683-1840》,载林达·约翰逊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⑧ 范金民、夏爱军《洞庭商帮》,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48页。

⑨ 王孝俭《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8页。

由苏州迁往上海^①。另如东山马正溥,其父马中钊,鸦片战争爆发时正在上海经商^②。

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和远东的金融中心,吸引大量移民涌入,苏州人是其中较早的群体之一。包天笑称“其实上海自开埠以来,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当时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都是苏州人来创始的。说句可耻的话,因为苏商的发展,妓馆也借说书为名,号称书寓,而成为苏帮了。”^③是否如包天笑所云,上海的“大商业”“都是苏州人来创始的”,由于史料缺乏,目前无从充分验证。但从个别例证可以看出,上海开埠后,苏州商人进军上海的时间似乎不比宁波人为晚。例如,苏州钱业巨头程卧云鉴于上海开埠后日益繁荣,钱庄业不断发展,遂奉父命携资十万两前往上海开设延泰钱庄。尤家原为苏州绸缎业巨头,上海开埠后,尤家迅速在上海开设同仁和绸缎庄分店和同仁和参店^④。一些上海老字号如“老妙香”化妆品店、“姑苏五芳斋”糕点店、“天晓得”糖果店、城隍庙“大殿梨膏糖”店、周虎臣笔墨庄等都是苏州人在上海开埠后开设的^⑤。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上海租界成为江浙难民的避难所,大批苏州绅民在这次“难民潮”中迁往上海。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及1860年太平军横扫江南,使苏南浙北大量人口涌入上海租界,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⑥。1860年6月2日,“苏城失守,藩臬各官具奔上海,制台亦逃上海,预为浮海之计”^⑦,不仅苏州官员齐聚上海,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士绅,其中著名的有富绅潘曾玮、名士冯桂芬等人^⑧。此时,大量苏州商人纷纷携资转往上海。如苏州“钱业三少”之一的卢少堂在经营钱庄发财后,便移资上海,专营地产^⑨。苏州四大中药店中的“良利堂”与“雷允上”亦将资财转向上海,才保全了老字号。包天笑的姑丈尤巽甫为苏州大族,“太平之战,他们逃难到上海等处”^⑩。《上海洞庭东山会馆记》记述洞庭东山人迁居上海的过程,称“初我山人素善贾,精华萃江、皖、淮、徐间。前清咸丰朝,发匪蹂躏东南,商业荡然,征贵贱者,群趋沪江。……同治朝,官军克复苏松,贼败分窜东山,山人避地来沪者众。”^⑪近代上海著名“买办世家”——洞庭席氏家族亦在此次战争期间迁往上海。太平天国战乱平定后,苏州人迁居上海谋生、经商的势头并未停止,如招商局经理施亦爵“乱平,至上海习钱业”^⑫,徐家培“乱后,避居海上”^⑬。虽然战乱平定后,大量苏州移民返乡,但亦有众多拥有巨资的苏州商人和地主从此定居上海。

19世纪80年代后,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轻纺工业的发展,吸纳了更多的外来移民。此一时期,苏州人迁沪亦不再局限于商人、地主和士绅阶层,众多苏州平民也陆续涌入上海谋生。据现有研究,上海工人虽然来源众多,但产业工人的精英——即从事高度熟练工种,以最高工资级别受雇者——主要来自广州和江南。在棉纺厂、缫丝厂、卷烟厂、面粉厂及有轨电车工业职员中,工资相对较高的岗位多数是江南人,尤其是丝织业中更主要以浙江、常州和苏州工人为主^⑭。此外,手艺人及苦力,诸如轿夫、堂倌、仆妇与刺绣工之类的亦不乏苏州人,如葛元煦

① (清)毛祥麟《墨余录》卷一,上海进步书局石印,出版年代不详。

② 马学强《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7页。

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

④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2页。

⑤ 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⑥ 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2、46页。

⑦ 南京大学太平天国研究室《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⑧ 董蔡时《太平天国在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⑨ 苏州文史资料委员会《苏州文史资料》第1—5辑,1990年,第58页。

⑩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⑪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1页。

⑫ 范金民、夏爱军《洞庭商帮》,第59页。

⑬ 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六,《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⑭ [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0页。

记载“轿夫以苏州、无锡人为佳, 上身不动, 坐着安稳。”^① 另据《海关报告》描述“侍候外国妇女的大多数女佣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绣工和妇女头饰工是苏州来的。”^②

20 世纪初, 上海人口持续快速增长, 从 1910 年的 1289353 人增长到 1937 年 3851976 人。随着移民潮的扩大, 有更多的苏州商人到上海经商、投资, 更多的平民到上海去谋生。如认为“上海是鬼子世界, 我们也不想发洋财”的桃花坞吴家也不再满足于“产业只限于苏州本地”, 开始在上海开设典当, 经营地产, “近来也渐有发展到上海之势”^③。民国初年, 仅苏州洞庭东山一地, “同乡散处申浦, 统政界、商界、学界、工界计之, 无虑千万人”^④。

光绪末年, 沪宁铁路筑成, 公路交通兴起, 交通日益便捷, 苏沪间的人口流动频率和规模大幅增加, 上海对于苏州的辐射和吸引也大幅增加, 苏州人迁沪的动因和渠道更为多元化。其中, 进入 20 世纪以后, 求学成为苏州人迁沪的一个重要动因和渠道。早在晚清, 上海新式学校相继建立, 旅沪商人即纷纷把子女送进新式学校就读。如席裕昆四个儿子中, 次子席德炯早年在南洋公学就读, 并留学美国; 三子席德熙就读于复旦大学。民国以后, 上海成为全国教育中心, 商业、法律、艺术、职业教育尤为发达, 成为各地学子求学圣地。在上海求学的苏州籍学生不少, 并纷纷组建“苏州旅沪同学会”, 如圣约翰大学 1922 年成立常熟同学会、1924 年成立苏州同学会(又称兄弟会)。据 1927 年《复旦大学同学录》记载, 1926、1927 年复旦大学吴县籍毕业生 26 位, 其中王维骥还考入复旦大学研究院, 毕业后任复旦实验中学教员; 在校江苏籍学生有 274 人, 其中吴县籍学生 55 位, 占江苏籍学生的 1/5。复旦中学在校江苏籍学生 137 人, 其中吴县籍 38 人, 占 28%^⑤。再如, 私立震旦大学医学院历年苏州籍毕业生有徐传俊、蒋桂生、吴必京、徐福燕、周仁和牙医周家肇、徐若芬等^⑥。

同乡组织是窥测地域移民规模和历程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近代上海, 随着旅沪苏州人的增多, 相继组建了一系列同乡、同业组织。从这些组织的组建时间和规模, 我们可以部分窥测出旅沪苏州人的大致情况(参见下表):

旅沪苏州人同乡、同业组织一览表

名称	成立时间	地点	组建者和成员
苏锡公所(永义堂)	乾隆嘉庆年间		苏州、无锡鲜肉经营业主组建。
成衣公所(轩辕殿)、(衣庄公所)	嘉庆二十二年(1817)	天灯弄	由朱朝云等沪、苏、宁等三帮发起, 成衣商人集资兴建
盛泾绸业公所	咸丰三年(1853)	苏州路盛泾里 242 号	盛泾、泗泾丝绸商人组建
茶食公所	光绪年间	尚文门路南应公祠路	苏帮茶食业主组建
上海盛泾绸业公所	清光绪十年(1884)	南苏州路 767 弄盛泾里 4 号	吴县盛泾、王江泾两地驻沪绸业申庄同业组建
书业崇德公所(上海书业崇德公所)	光绪十二年(1886)	新北门老街(今丽水路) 72 号	由迁居上海的苏州书商筹款创建
云锦公所	光绪二十年(1894)	唐家弄普福里(今北苏州路)	苏州绸布商人主管的苏缎批发业主组建
苏州集义公所(集义公所、苏州会馆)	光绪三十二年(1906)	法租界西门路白尔路 207 号(打铁浜)	苏州旅沪经营日本海产杂货商帮创建

① 葛元煦《沪游杂记》,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03、273 页。

②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882—1931》,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1 页。

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第 365 页。

④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第 892 页。

⑤ 《复旦大学同学录》(1927 年),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 档号: Y8—1—158。

⑥ 《私立震旦大学医学院历年毕业生一览表》,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 档号: B242—1—152—1。

续表

名称	成立时间	地点	组建者和成员
珠宝业公所(韞怀堂、新汇市公所)	光绪三十四年(1908)	侯家路北首	苏帮珠宝业商沈时丰等组建
常熟米业公所		新昌路529弄374号	
驻沪常熟米商公所		闸北长安路长春坊	
平江公所(梓安堂、敬安堂)	光绪十九年(1893)	新闸路大通路口	严春旋等集资修建,成员为苏州府九邑商人
金庭会馆	1914年6月	小南门外陆家浜路1009号	吴县洞庭西山旅沪商帮创建
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	1912年	爱文义路	张知笙、席锡蕃等发起,苏州洞庭旅沪工商业者组建
东山会馆	1915年	卢湾区丽园路433—437号	莫厘三善堂(成立于同治初年)与洞庭东山同乡会合建
苏州旅沪同乡会	1919年(1945年重新成立)	大通路347号	杨叔英、陈养泉、贝润生等发起,旧苏州府属旅沪人士组建
吴江旅沪同乡会	1919年	老垃圾桥貽德路,后迁至吴江路75号	施子英、钱慈念等发起,江苏吴江旅沪工商业者组建
洞庭西山旅沪同乡会	1921年6月	南市陆家浜路大兴街	江苏洞庭西山旅沪同乡筹建
吴江会馆	1922年	闸北普善路310号	江苏吴江旅沪工商业者组建
昆山旅沪同乡会	1946年7月	永嘉路368号	
常熟旅沪同乡会	1948年1月	中正北二路75号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藏档,档号:Q117-12、Q117-9、Q117-23、Q118-4;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6页、第91—96页;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05—409页;上海历史博物馆《都会遗踪》第二辑,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181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清乾嘉时期,旅沪苏州人组织以同业公所为主,且往往与其他县份合组。上海开埠以后,虽然以行业为标准的公所依然在相继组建,但以地缘为纽带的公所、会馆、同乡会开始出现,既有以苏州府为单位的同乡组织,如平江公所、苏州旅沪同乡会;也有以县为单位的同乡组织,如吴江会馆、常熟旅沪同乡会;甚至有以镇为单位的同乡组织,如金庭会馆、洞庭西山旅沪同乡会、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等。这间接表明,旅沪苏州人的规模逐渐扩大。

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准确统计旅沪苏州人的确切数量,但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苏州商人赴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各市镇经商甚至定居。近代以来,苏州人迁沪人数更是激增,且迁居途径日趋多元化。

二、旅沪苏州人与上海社会

俗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的自然条件及人文社会环境,对一方人群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各地特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区域特征以及悠久民俗传统的“区域人群”。当这些区域人群迁居外地之时,也必然随之将这些区域特征带到迁居之地,由此形成移民社会中一种色彩斑斓的现象。近代上海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大都会,也充分体现出这种充满地域色彩的群体特征。如吴趸人《沪上百多谈》即指出,在晚清上海,“衙门里师爷多绍兴人,剃头司务多句容人,典当朝奉多徽州人。……卖土挑膏多广东人,卖熏肠熏腊多无锡人,卖拳多山东人,收纸锭灰多绍兴人,酱园多海盐人,药店多宁波人”^①。近年来上海移民群

^① 吴趸人《吴趸人全集》第八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3页。

体的研究也充分证明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如上海的宁波人以工商、金融为主要行业, 广东人亦以工商业为主, 湖州人在缫丝业最为集中, 苏北人则以从事苦力和工厂做工为多。那么, 旅沪苏州人在行业上有什么特征? 旅沪苏州人为近代上海文化形成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

上海档案馆藏有 1946 年苏州旅沪同乡会复会大会成员名单, 其中, 党政军警组 13 人、银钱业 16 人、金业 2 人、珠宝业 2 人、证券业 1 人、保险业 1 人、颜料业 5 人、旅馆业 1 人、棉纱业 1 人、洋货业 1 人、南北货 1 人、进出口 1 人、中药业 1 人、绸缎业 2 人、纸业 2 人、印刷广告 2 人、地产 4 人、布厂 1 人、牛乳厂 2 人、纱厂 1 人、皮件厂 2 人、西医 4 人、中医 1 人、医院 1 人、古玩 1 人、话剧 1 人、游艺 1 人、电影 1 人、律师 3 人、文化 10 人、教育 2 人、团体 5 人, 共 92 人, 基本涵盖了当时旅沪苏州人中的著名人士^①。成员不仅人数众多, 而且涵盖行业广泛, 其中政党军警组、银钱业和文化行业人数最众。据笔者分析, 党政军警组人数众多, 应与苏州人钱大钧(1893—1982, 字慕尹) 时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有关, 可能并非通常状况。综合多种资料, 笔者认为, 旅沪苏州人在近代上海金融业、工商业、文化教育和娱乐业等四个行业具有较为突出的地位。现分别述之如下:

1. 旅沪苏州人与上海金融业

苏州人在近代上海金融业的地位, 可以从买办说起。买办为近代中国各外国洋行和银行雇佣的经纪人。上海开埠初期, 买办以广东人居多, 但很快江浙籍买办逐渐取代广东买办的地位, 其中苏州籍买办仅次于宁波籍买办, 具有重要地位。如著名的东山席氏家族, 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迁往沪地, 自席元乐的四个儿子席素煊、席素贵、席素荣、席素恒开始, 纷纷出任外商银行买办, 其中席素贵任汇丰银行买办长达 30 年之久, 在他的帮带下, 形成一个买办世家。据统计, 席氏家族共有 23 人担任过 13 家外商银行的买办, 其中英商 6 家, 美商和日商各 2 家, 俄、法、意商各 1 家^②。席家除任外商银行买办外, 还出任洋行买办。如著名的沙逊洋行买办沈吉成, 为席品方四子, 从小过继给母舅沈二园为子, 沈二园去世后, 沈吉成为沙逊洋行买办, 人称“沙逊阿四”。洞庭东山另一望族严氏家族的严峻叔为礼和、老公茂、谦和洋行买办, 严兰卿任敦裕洋行买办。东山富商朱蔼堂亦先后任开利、百司、基大等洋行买办^③。

钱庄为中国传统金融机构, 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苏州商人在上海开设的钱庄数量虽比不过宁波帮, 但经济实力雄厚, 在钱业中的地位甚为显赫。如苏州程氏在上海的福源、顺康、福康钱庄, 资金实力雄厚, 所聘经理皆为钱业佼佼者。其中, 福源钱庄的秦润卿曾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④; 顺康的朱五楼则担任过北市钱业公会董事、上海钱业公会会长^⑤。而且, 洞庭商帮在钱业中的份量, 似有不断加强的趋势, 如 1933 年与 1921 年相比, 上海钱庄中绍兴帮减少 1 家, 宁波帮保持不变, 上海本帮减少 4 家, 而洞庭山帮增加了 3 家^⑥。据不完全统计, 洞庭商帮在近代上海至少开设或投资了 65 家钱庄^⑦。另, 1934 年《本市钱业同业公会入会同业一览》记载上海钱庄 65 家, 其中苏州人合股或独资的 16 家, 占 24.6%^⑧。以上皆可见苏州人在上海钱业中的地位。

在西方银行制度影响下, 上海的银行业日益发展。1932 年, 上海银行达到 70 多家, 其中由苏州帮(洞庭山帮) 设立者 4 家, 即严锡蕃、王毅斋等创办的纱业银行; 席季明、席少荪等创

① 《苏州旅沪同乡会理监事、特别会员、普通会员和选举理监事选票及社会局关于理监事宣誓就职的指令》,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档号: Q117-12-2。

② 席德基 《东山席家与上海金融业》, 《吴县文史资料》第 9 辑, 第 194 页。

③ 郭绪印 《老上海的同乡团体》, 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97 页。

④ 熊月之 《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02 页。

⑤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钱庄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第 648 页。

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钱庄史料》, 第 771 页。

⑦ 郭绪印 《老上海的同乡团体》, 第 301 页。

⑧ 《本市钱业同业公会入会同业一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档号: Q320-1-1435。

立的惠丰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商业银行; 严敬舆创设的东南植业银行^①。此时, 旅沪苏州人因其在金融业中的传统优势, 纷纷到银行任职。如席正甫因参与筹建户部银行, 他和几个儿子先后入股, 席正甫拥有该行商股 1320 股, 占 6.6%^②。户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 席裕光出任该分行副经理。1912 年, 江苏银行成立, 席立功和王俊臣为该行董事, 张知笙任该行理事, 严锡蕃初任无锡分行经理, 后任上海总行经理。1915 年, 贝理泰协助陈光甫、庄得之创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1917 年出任苏州分行经理^③。金采生先后任中国实业银行经理、四明银行经理; 席光熙曾任职中孚银行, 并于 1935 年转入交通银行; 叶扶霄于 1920 年出任大陆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 并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主席; 王子厚出任东莱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并兼任信托部经理和信托部地产主任。

2. 旅沪苏州人与上海工商业

在近代上海工商业中, 苏州商人在金号行业具相当实力, 由苏州商人开设的金号至少有 15 家。其中吴县龚家“世代经营金业, 在上海金业界中, 亦推巨擘”^④。同丰永金号由苏州商人程志范、程少甫昆仲及徐凤辉等人合伙经营, 其中, 徐凤辉曾任金业交易所理事长, 20 世纪 30 年代资金估计达 1000 万元, 财力为同业之冠^⑤。另外, 席存堃在上海与人合资开设杨庆和发记银楼, 并任经理。1927 年, 席存堃代表上海银楼公所, 被推选为上海总商会会员。

苏州帮是上海最早涉足颜料业的商帮之一, 较著名的颜料行有瑞康、成康和豫康等。成康由苏州商人张少霞独资设立, 张少霞之子张珍侯曾任上海颜料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16 岁时, 贝润生进瑞康颜料行当学徒, 并于 1898 年接替奚润如出任瑞康颜料行经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 贝润生获得拜耳公司生产的“阴丹士林”垄断经营权, 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颜料大王”^⑥。

丝绸、棉布是苏州、松江一带土产, 故苏州商人经营丝绸、棉布者为数众多, 为传统优势项目。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 苏州商人开设的棉布号有 32 家之多, 资金实力比较雄厚的有同利棉布号、同新祥洋货号、同丰棉布号和同春祥棉布号等^⑦。丝绸业从业者更多, 据《上海绸缎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记载, 苏州商人经营的商号有 70 余家, 丝栈如席春元的丰丝栈, 朱月树的信泰、恒盛丝栈, 绸缎有王、沈两家合资在上海南、北市设立的天成绸缎局, 北市有六大绸缎局, 其中大纶和大盛为苏州人开设。上海大纶绸缎局的席守愚在绸缎业颇有声望, 被推为上海绪纶公所会长。近代工厂兴起以后, 苏州商人纷纷在上海创设织绸厂, 据同业公会资料统计, 苏州商人设立的织绸厂至少 9 家, 包括久大织绸厂、福新绸厂、华达电力织绸厂、沪海织物准备厂、元泰织绸厂等^⑧。此外, 苏州商人亦投资毛绒厂、棉纺厂, 如叶明斋创建振华纱厂、龙华制革厂; 席立功与人合资设立上海公益纱厂; 邱玉如与席润生创办第一染织厂, 并自织布匹, 为布业界领袖; 张紫绶创设多家呢绒织布厂, 都经营得不错; 沈莱舟则先后创办恒源祥绒线号、裕民毛绒线厂, 并兼任恒丰毛绒厂、恒源祥织布厂总经理, 号称“绒线大王”, 并被推举为上海市毛纶业公会理事长。

此外, 旅沪苏州人在上海典当业、海产杂货业以及糖行和南北货行也有不错的业绩。上海典当业主要有徽州帮、潮州帮和本地帮, 本地帮指上海、苏州、洞庭商人经营的典当业, 他们成立

①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惠丰储蓄银行账目审查、代办企业注册、商标注册等文件》, 上海档案馆藏档, 档号: Q90-1-680。

② 易继仓 《买办与上海金融近代化》,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00 页。

③ 张晰 《民国金融巨子贝祖诒》, 《浙江档案》2007 年第 11 期。

④ 包天笑 《钊影楼回忆录》, 第 329 页。

⑤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号业调查资料》, 上海档案馆藏档, 档号: Q275-1-4824。

⑥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都会遗踪》第二辑, 学林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91 页。

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棉布业调查资料》, 上海档案馆藏档, 档号: Q275-1-4911。

⑧ 宋钻友 《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26 页。

于咸丰年间, 清末续所发展。早在上海开埠前, 苏州洞庭商人就在上海经营海味行, 如“鼎裕”和“老茂和”。鸦片战争后, 苏州商人在上海经营海产杂货, 主要有洋行街的“源来”、“同兴”、“宝来”, 龙潭路上的“同福和”。近代上海糖行帮别大致有三: 一宁波帮, 二镇江帮, 三本帮(主要包括苏沪两地经营者)。苏州商人郑品南、郑泽南兄弟开设的广源、大兴, 席菊茹在公共租界设立的长百(主要经营台糖), 吴兰荪开设的恒隆等都是近代上海有名的糖行和南北货行。郑泽南还开办有糖业学校, 并因声誉、业务被推为糖业公会主席。

3. 旅沪苏州人与上海文教业

开埠后, 上海成为西学传播中心和中国近代化的窗口, 吸引了不少文人、学者旅居或工作在上海。旅沪苏州人延续其崇文重教的传统, 在近代上海的文化、教育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946 年出席苏州旅沪同乡会复会大会的 92 位成员中, 从事文化教育和自由职业者(包括西医、中医、古玩、电影、游艺、话剧、律师等) 共 24 人, 占 26.08%, 远远高于其他旅沪同乡会相关行业所占比率^①。

苏州文人进军上海, 首推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人王韬。1849 年, 王韬进入墨海书馆, 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对西学有相当了解的中国文人, 亦成为苏州人进军上海文化教育界的先声。清末民国时期, 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和报刊出版业的发展, 苏州文人更是大量进入上海, 并充斥在上海文教行业。

报馆和出版印刷机构是近代旅沪文人的首选职业之一, 他们往往集办报、写作、编辑、译书于一身, 并往往身兼数职。从籍贯来说, 上海报人一直以江浙籍居多, 如 1939 年 4 月, 申报馆员工 476 人, 非江浙籍人士仅 29 人(其中包括 3 名美国人)^②。其中苏州籍报人不少, 如 1938 年申报馆招收练习员、生 721 人, 其中苏州籍 69 人, 占 9.57%, 及格者苏州籍 9 人, 占 8.4%^③。大量苏州籍旅沪文人栖身于报馆、书局, 其中著名者如“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和报人包天笑与周瘦鹃, 商务印书馆的叶圣陶、王伯祥等人以及众多南社成员。

南社于 1909 年 11 月成立于苏州虎丘, 为江浙地区文人结社。辛亥革命前后, 南社社友纷纷赴沪, 上海成为南社活动中心, 至 1936 年社友达一千多人。南社社友来自全国各地, 但创始人如柳亚子、叶楚傖、陈去病等皆隶籍吴江, 因此南社社友亦主要来自吴江、嘉善、吴县、吴兴等地。据《南社社友姓氏录》统计, 南社社友总计 1184 人, 298 人来自江苏, 占 25.17%; 219 人来自浙江, 占 18.5%; 173 人来自广东, 占 14.61%; 135 人来自上海, 占 11.4%。其中苏州地区, 吴江 83 人, 吴县 26 人, 常熟 20 人, 昆山 6 人^④。辛亥革命前后, 南社苏州籍成员在上海创办众多报刊, 亦为上海文化事业的一时盛举^⑤。

随着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发展, “学而优则教”成为“学而优则仕”之外的另一选择。据《申报》记载“计上海大小馆地不下千余, 其师为浙江各属及苏、太之人居多。”^⑥许多苏州文人都曾参与学校教育活动, 如王韬曾任格致书院山长; 冯桂芬任敬业书院山长; 吴大澂、沈恩孚先后任上海龙门书院院长; 陆润庠出任上海蕊珠书院院长; 包天笑曾在女子蚕业学堂、城东女学校、民力女中学校担任教师。民国以来, 苏州寓沪文人以学校为业的人更多, 如郭绍虞早年曾任小学教师, 1913 年到上海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先后任上海复旦大学、光华学院、同济大学教授

① 如歙县旅沪同乡会 1948 年理事名单录中, 从事文化教育者只有 3 人, 占 7.89%; 宁波旅沪同乡会 1945 年改选名单中, 政界、新闻界、法律界和文化教育界共 10 人, 占 23.25%。

② 申报馆编《美商申报馆同人录》, 1939 年 4 月编印。

③ 《申报馆第二届应征练习员、生名册及初试及格者名册》, 上海档案馆藏档, 档号: Q430-1-2-23。

④ 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第 360—410 页。

⑤ 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 第 360—410 页; 上海历史博物馆编《都会遗踪》第四辑, 学林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78—79 页。

⑥ 《申报》影印本, 1872 年 8 月 17 日。

兼中文系主任。苏州著名学者孙德谦辛亥以后移居上海, 历任东吴、大夏、交通和政法等大学教授^①。另外, 据民国十六年《复旦大学同学录》记载, 复旦大学大学部苏州籍教员有顾康乐(力学)、孙本文(社会学)、徐家保、徐蔚南、蒋天鹤等。

20世纪20年代后, 随着新式职业领域的发展, 接受系统训练、并通过考核获得从业资格的自由职业者开始出现, 如律师、大中学教师、会计师、新闻记者等。苏州人在上海从事各类自由职业者, 为数不少。如上海律师公会创立于1912年12月8日, 会长陈则民, 副会长狄梁孙, 皆为苏州籍^②。据《上海高等法院关于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登记名册》, 上海从业律师中苏州籍129名, 占总登记名册的10.66%, 以至于一些苏州籍律师曾一度动议把上海律师公会会所设在上海之外的江苏地区^③。另外, 据许晚成统计, 20世纪40年代上海名人中, 苏州籍人士168人, 从事自由职业者36人, 其中大中学教授21人, 占12.5%; 新闻记者5人, 占3%; 医疗从业者6人, 占3.57%; 律师3人; 工程师1人^④。以上皆可见苏州人在近代上海文教行业和自由职业中的优势地位。

4. 旅沪苏州人与上海娱乐行业

也许最能表明苏州“风气”向上海转移的是评弹、昆曲在上海的兴盛。评弹、昆曲产生于明代中期, 一直以苏州为流行中心, 并逐渐向江南地区传播。据陈无我回忆“吴门有金耀详者, 说评话, 善诙谐。一言方启, 满座轩渠。因之身价自高, 每三年来申一次。”^⑤可见, 此时的上海还只是评弹艺人外出的小码头之一。太平天国战后, 随着江浙人士大规模移居上海, 评弹中心也由苏州转向上海。书场开始在上海大量出现, “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的时期, 三四马路、大新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 简直是五步一家, 十步一处, 到处悬挂着书场的灯笼与招牌”^⑥。民国初年, 上海楼外楼、天外天、云外楼、绣云天、劝业场、大世界、先施、永安等游艺场相继开辟书场, 并以重金罗致名家响档来上海说书。他们与艺人签订合同, 往往要求艺人待上一年半载, 于是苏州评弹艺人在上海的滞留时间越来越长, 上海逐渐成为评弹演出的大码头。如1931年《申报》记载“十年以来, 一般略具寸长之苏道说书人员, 麇集沪埠, 恋恋不去, 非特苏之松太常, 浙之嘉湖境属各乡镇, 无说唱兼工之名家莅临, 即光裕社产生地之苏州城内外各书场, 亦都滥竽充数。以故今年该社变节社员夏荷生, 至苏弹唱。”^⑦评弹艺人群集沪上, 苏州反而要到上海去请评弹名家了。

昆曲展现与评弹一样的轨迹。早在1842年, 苏州鸿福班就挺进上海, 被称为上海昆班领袖。太平军攻占苏州后, 大批昆曲戏班与艺人逃亡上海, 昆曲的活动中心亦逐渐转入上海。太平天国战乱后, 苏州著名的大章班、大雅班、全福班主要以上海为演出基地, 且“生意不恶”^⑧。1851年, 上海旧城厢内创办三雅园, 为上海最早的戏院, 专演昆曲。1854年, 小刀会起义时, 戏院被战火所焚。1864年, 昆曲艺人陆吉祥与人合资在英租界重新开设三雅园, 正好与苏州大章、大雅两班来上海演出时间一致。《沪游杂记》记载“文班唱昆曲皆姑苏大章、大雅两班所演, 始于同治二年。”^⑨同治末年, 随着京剧的流行, 相对高雅的昆曲逐渐式微。

谈到旅沪苏州人对上海娱乐业的影响, 似乎亦不可忽略妓女行业。清末上海葛元熙曾描绘

① 中国地方志集成: 民国《吴县志》,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1139页。

② 陈则民(1881—1951), 吴县人。日本大学法科毕业, 中华民国政治家、律师。在上海任开业律师, 曾任律师公会会长; 狄梁孙, 常熟人。日本法政大学法学士。辛亥革命后, 到上海当律师, 曾任律师公会副会长。

③ 《上海高等法院关于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登记名册》, 上海档案馆藏档, 档号: Q187—1—188。

④ 许晚成《上海百业人才小史》, (上海)龙文书店编辑部, 1944年。

⑤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第47页。

⑥ 唐凤春口述材料, 转引自唐力行《从苏州到上海: 评弹与都市文化圈的变迁》, 《史林》2010年第4期。

⑦ 《申报》1931年6月23日。

⑧ 曾朴《孽海花》,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第6页。

⑨ 葛元熙《沪游杂记》,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第131页。

说,“画阁沿街添几处,绝好堂馆,都是苏州女”^①。可见苏州妓女在上海性产业中的地位。让我们先从“书寓”说起。“书寓”一词指的是高级妓女的寓所或说书的场所。据安克强考证,“书寓”一词在上海的正式出现是在 1851 年,是从苏州传来^②。包天笑亦云“因为苏商的发展,妓馆也借说书为名,号称书寓,而成为苏帮了。”^③可见“书寓”一词代表苏州的妓女文化。约 1850 年代之前,苏州妓女逐渐向上海进军,此时,上海高级妓女有苏州、南京、扬州、宁波、湖州、湖北、江西等多个群体,但此后,苏州妓女排挤掉了所有竞争对手并主导了书寓界^④。安克强指出,清末文人王韬的文集中曾出现 106 个高级妓女,其中 54 名来自江苏,而苏州地区 16 个,占大多数;出版于 1923 年的《上海览游指南》亦指出,“书寓”群体清一色由苏州籍女子组成。此外,安克强还曾根据 1923 年高级妓女申请在法租界开业的警方报告,整理出一份 77 名高级妓女的籍贯表,其中苏州籍 63 人,占 82%,皆可见苏州妓女在上海高级妓女界之统治地位^⑤。进入 20 世纪以后,代表高级妓女的“书寓”逐渐受到普通妓女的挑战,并逐渐消失,但苏州籍妓女在上海妓女中的优势地位并未随之减弱。据 1946 年 9 月份上海娼妓统计,已登记妓女 4000 多人,其中,苏州籍 640 人,占 11.5%,占比依然最高^⑥。显然,在政府登记的妓女只是妓女群体的一小部分。据安克强统计,1875 年上海妓女约 5500—6500 人,1915 年 10000—15000 人,1920 年 15000—20000 人,1930 年约 30000 人,1948 年约 50000 人^⑦。考虑苏州籍妓女以中高层为主,未登记妓女以下层妓女为多等因素,估计苏州籍妓女亦应有 10000 人左右。

三、结 语

宫崎市定所云“近现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略有简单化的嫌疑,因为近代上海的繁荣并不仅仅是苏州繁荣的地点转移,还具有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转型的义涵。但无疑,苏州繁荣向上海的转移应是近现代上海繁荣的重要基础,而苏州繁荣向上海转移的最主要途径是人口移动。随着大量苏州人迁居沪上,不仅带来苏州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也将苏州的风气带入上海。

通过本文可见,明末以来,苏州商人逐渐向上海所在的松江地区发展,这一个潮流到上海开埠以后日益明显,太平天国战乱更是导致苏州人大规模迁居上海。此后,随着上海的日益崛起和苏州的日益衰落,苏州人迁沪的浪潮不可遏制。由于人口统计数据的欠缺,我们很难确切估量近代上海苏州人的数量,但可以推测,与其他地域的移民群体相比,苏州人的数量应更为巨大,只是由于语言、文化习俗接近,苏州人很容易与本地人融合,因此不像广东人、福建人、宁波人、苏北人等相对异质文化群体那样受到关注^⑧。

开埠以前,上海的客帮大多数来自闽粤浙鲁等沿海数省商帮^⑨。近代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事以后,上海相邻江浙两省商人大批涌入,并取代此前闽、粤、鲁商帮的地位,从而形成民国时期的“江浙财阀”。其中,苏州商人与宁波商人一样,在上海金融工商界具有不可轻忽的实力。同时,因长期以来的崇文传统,苏州人在上海文化教育界以及律师等自由职业界具有优势地位。

唐宋以来,苏州逐渐取得了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与之毗邻的

① 葛元煦《沪游杂记》,第 273 页。

② [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 页。

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5 页。

④⑤ [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第 27、28 页。

⑥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77 页。

⑦ [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第 133 页。

⑧ 这通过旅沪苏州商人往往与上海本地商人结合为“本地帮”可以看出。

⑨ 马学强《上海通史·古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0 页。

上海地区, 兴起相对较晚, 缺乏苏州那样的悠久传统, 因而在文化上长期追随苏州而易受其影响^①。近代以来, 随着大量苏州人迁居沪上, 并在金融、工商、文教、娱乐等行业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而更是将苏州文化全面地带入上海, 这不仅从今日上海话的构成可以看出, 近代苏州评弹、昆曲以及妓女文化在上海的流行亦可证明^②。

近代上海是一个移民社会, 由于移民来源的多元性, 导致了近代海派文化的复合性。但在这种多元性和复合性的背后还有一种主导型元素提供底色, 这便是江浙文化居于统治地位, 而其中苏州文化更是近代海派文化的重要母体。就好像美国文化虽然是典型的包罗万象的移民文化, 但仍以英裔文化为底色一样。

恰如宫崎市定所言, 苏州文化为近现代上海文化提供了底色, 而这种转移和嫁接则是通过人员的流动来实现的。相信通过对沪苏两地人员流动的深入研究, 会使我们对这两座城市的历史进程有更深入的理解, 也会对当代这两座城市的协调发展有着一定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陈炜祺)

On Cultural Background of Modern Shanghai: Suzhou Immigrants and Modern Shanghai

Zhang Xiaochuan

Abstract: Modern Shanghai's prosperity founded on the influx of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among them the immigration from Suzhou Fu which adjacent to Shanghai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uzhou businessman has begun to trading in Songjiang District, but the scale is limited. After the opening of Shanghai as treaty port, especially during and after the Taiping war, the Suzhou immigration to Shanghai became larger, and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scale and form the trend. In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ways by which Suzhou immigration moved to Shanghai became more diversify. Suzhou immigration has certain dominance in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industry and educational industry of modern Shanghai, and Suzhou Pingtan, Kun Opera and other cultural forms from Suzhou are also dominant in entertainment market of modern Shanghai.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from Suzhou moved to Shanghai, Suzhou culture floods into Shanghai and provides a back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of modern Shanghai.

Keywords: Modern Shanghai; Suzhou Immigration; Relations between Suzhou and Shanghai

① [日] 宫崎市定 《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 载刘俊文主编, 栾成显、南炳文译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 第 245 页。

② 徐国桢指出, 上海话“分作三个大系统”, 其中“苏州系占 75%, 宁波系占 10%, 广州系占 0.5%, 其他占 14.5%”。徐国桢 《上海生活》, 上海世界书局 1933 年版, 第 15 页。